

杜安战争代士明居士

杜安战争代士明居士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带来残酷死亡的种种决定。有许多这样的特工人员和抵抗战士躺在无名荒冢之下。为人们所知晓的人相当少，只有机密档案中提及他们。大多数幸存者又从事和平事业，得不到荣誉或奖赏。本书提到的，只是那庞大的隐蔽军队中的少数人，对这些人，自由世界是感恩不尽的。

透露这些情况还有一些与个人关系不那么大、但却更加深刻的原因。

随着 1945 年轴心国被打垮，缴械投降，协调局解散了它那错综复杂的组织机构，于是销声匿迹。在它的风云变幻的岁月里，战斗出现了转折，原先已近乎致命的失败，后来取得了压倒之势的大胜利。大同盟在如火如荼的考验中占了上风。这场大杀戮使一千一百万人丧生，鬼魂发出震耳欲聋的呼号，反对现代野蛮行径的狠毒。伦敦、柏林、广岛和其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地方的残垣断壁提醒人们莫忘战争新概念的怪诞；这种新概念绝不饶恕平民，纵然是婴儿和老弱或孤寡者。然而，早期的联合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国际上会信守礼让原则和采取理性行动。纽伦堡即将作出的裁决似乎会预示长期求而不得的世人良知的觉醒及对残害人类的罪责的确认。我们怀着渴望的心情期待着全球是一片平安共处的大好春光。

战斗力如此惊人的秘密战争这一武器，是在战斗的洗礼中应运而生的。在和平环境里，它没有用武之地。使我十分宽慰的是：“勇士”不再会成为一个情报网的头头的代号了。我收起有关协调局的所有卷册，希望永世不再打开。

在现实生活中，如果我们以为可以抹掉已经于过的事，勾

销我们对邪恶的了解，不发明我们已发明的武器，收拾起那些仍放在某个安全的隐蔽处的东西，那也未免有点鲁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仍狰狞地历历在目，空气中尚有恶臭，而国际大家庭就开始四分五裂了。它的成员分帮结派，诉诸威胁，直至暴力和战争。事情已证明和平必然来到只不过是一个靠不住的梦想。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后来写道：“就这样，伟大的民主国家为胜利而得意洋洋。就这样，又采取了几乎断送它们生命的愚蠢态度。”

丘吉尔虽然善于逆料，他还是没有预见到这种愚蠢态度会发展到如此可怕的极端：外交是在核恐怖均势中办理的；抵抗策略成了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者的指导原则；情报机构在技术上发展到了这样一个水平，足以危及国家的原则，而当初建立国家正是为了捍卫这些原则。这种勾心斗角的种子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播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秘密活动中。极端严重的问题出现了：十分重要的大事是由出类拔萃的集团在加以操纵的吗？在受命掌管情报工作中的人中有妄自尊大、雄心勃勃的人玩世不恭地改变原则吗？过去三十年里，在拯救自由世界使之免于毁灭或奴役的斗争中发挥过决定性作用的这支利他主义力量情况如何呢？为了明公正断，现在必须明晰过去。翻开卷册的时候已到。

任务看来颇为简单，但存在着一些障碍。战后数十年内，大量收集并广泛传播了许多错误情况。这种情况系商业剥削者所造成，他们为了出名而丝毫不顾事实真相。但是，许多人在得到苦心的（虽不甚彻底的）研究工作的支持下进行的认真努力，只提供了不完整的因而也是非预期的不准确的记叙。

精心保守的机密自然会使最尽职的调查员也束手无策。而且，说来具有讽刺意味，我们为了迷惑对手而蓄意制造的一些假象仍然被普遍当作真事。这对真相无益，对虚荣心却有好处，记叙里往往添枝加叶，夹进一些虚构的惊险活动和耸人听闻的内容，而如果让人们知道了，这种记叙肯定会更引人入胜。真实情况由于迫使人们保持缄默，这种错误的说法未能得到纠正，甚至人们也不能对之发表温和的意见。现在可以彻底戳穿这些根深蒂固的谬见和未遭到否认的臆说吧。

协调局文献涉及到一系列庞大而又复杂的事件。作家兼历史学家柯尼利厄斯·赖恩曾受聘考虑编一部秘密战争史，他查阅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许多文件。美国战略情报局相当于英国安全协调局。赖恩于1972年9月17日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只要跨进那个神秘世界一会儿，就足以使我相信，令人生畏的任务在等待着历史学家。……由于情报活动本身有多种外貌，历史学家要探索真情，去伪存真，这或许很需要同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人员一样多的训练有素的研究人员。”

幸亏协调局的历史学家自己已汇集了文献，提供了一个概况“以供查阅”，“如果将来有必要再进行这种秘密活动的话”——我当时这样写道。这些文献包括许多厚卷和证件，涉及五年中的紧张活动和在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活动。

尽管这个概况使我的朋友和昔日同事威廉·史蒂文森承担的任务方便了一些，但并没有解除他从如此浩瀚的记载中进行调查和作出选择的极其沉重的负担。他是一位不辞劳苦的研究人员，并从许多其他方面吸取了资料。我们的共同兴

趣使得我们无法避免如下结论：他应该写出这部记事。然而，他个性太强，很有自己见地，因而不会借用我的观点。（尽管我们的姓名相似，我们却不是亲戚。）我没有参与其材料选择。我阅读了手稿，我担保它是可靠的。我欣然回答了作者提出的许多探究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现在和将来必须回答的更大问题的一部分：民主国家要让自己生存下去吗？

1939年以前，我们没能正视这个紧要问题。没有一个民主国家真心实意地抗击过危及生存的明显威胁。它们不愿团结，不愿重新武装，也不愿考虑为了个体或集体安全作出牺牲。有那么一些人，他们竟认为牺牲是不必要的。今天，我们又听到了类似的论点，向我们作了类似的回答。

我们有理由厌恶秘密；它对民主原则和自由政府是个潜在威胁。然而，如果我们竟忘记秘密曾经一度几乎是我们唯一的防卫手段，那我们就是欺骗自己了。它不仅使我们赢得胜利，而且拯救了从事那种危险事业的许多人的生命。

秘密这个武器在一个理想世界里是不需要的。但是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不宣而战的世界里；这里，这种武器经常不断地被用来反对我们，除非采取对策，否则会再次使我们措手不及，而且这一次要对付的进攻规模之大是难以想象的。尽管强调如此明明白白的论点似乎是多余的，但如果我们取消秘密，秘密这个武器也就不起作用了。民主政治的条件之一是新闻自由。确切地了解我们的情报机关如何行使职能，为什么那样干以及在什么地方活动，这是十分可取的。但是，这种消息一旦公诸于众，我们就会被解除武装了。

所以难题就在这里：我们如何运用秘密这个武器而又不

伤害自己呢？我们怎样保守秘密而又不违背宪法和个人自由的保证呢？

也许有关协调局的事迹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现在人所共知的是，敌人的密码被破译了；特工干部安插到了敌人阵营内部；把新技术交给特工人员和游击队员使用。同样真实可靠但不那么明显的是协调局的一个重要特征——它由志愿的文职人员所组成，他们确信个人自由是人类进步的根本。我们是受过自由思考的个人的一些传统熏陶的业余谍报人员。因为我们队伍中有意见分歧，有时我感到纳闷，我们怎样取得胜利的呢。随后，我又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之所以能成功，是因为我们具有健全而独立的思想。严峻的决定是在痛苦中作出的。罗斯福肯定是在这个过程中费尽了心血，而孤军作战的特工人员又不得不联系敌人对自己亲人会实行报复来权衡单枪匹马的行动。我们之所以战胜，是因为我们事先得知敌人的计划，我们能够影响那些计划，并能采用至今尚未公开的办法抢在敌人之前行动。抵抗部队在其他一些也同样有决定性意义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抵抗部队这个名称指的是沦陷区中酷爱自由、而且确实愿意在任何逆境中为自由而战的人们。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参照秘密战争情况而修改时，如下一点可能是最引人注目的因素：巨大毁灭性武器并没有决定战争的结局。决定战局的是自由人民的战无不胜和自由人民的机敏才智。我相信这一点，我今天也相信人类抵抗精神决不会被单纯技术所摧毁。

也许有那么一天将要露出曙光，那时，暴君不再能威胁任何人的自由，而且所有国家的意识形态不管差别多大，它们的

职能将是丰富生活，而不是控制生活。如果有可能出现这种状况，那也是在非常遥远而人们无法预见的将来。在那个更安全、更美好的日子到来之前，民主国家只有保持其防卫力量才能避免灾难，才能避免可能的彻底毁灭。

在世界各地越来越复杂的武器中，谍报活动是一种必不可少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武器。但由于这个武器是秘密的，所以也是最危险的。防止滥用的保障措施必须制定、修改并严格执行。但是，同其他事业中的情况一样，被委派从事这项工作的那些人的性格和智慧将起决定作用。自由人民坚持并取得胜利的希望在于这种保护人的良好品德。

有人宣称，人类进步如何视挑战而定，个人和国家有必要信奉一种事业并为之而奋斗。有些理论家扩大了本能行为的这种应用以说明我们称之为“战争”的那种间歇性大屠杀。这种观点的价值是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研究的问题。就我而言，似乎昭然若揭的是人类已经有可怕的敌人要对付——例如贫穷，疾病和无知——而在这种共同事业中，奖赏和荣誉很多，我们大家都是有机会得到的。

威廉·斯蒂芬森爵士

于百慕大

打破沉默

埃利斯所写的序

在美国处于和平以及处于战争时，英国以纽约为基地，指挥着历史上最复杂的一体化情报和秘密活动组织。这种活动可以保密吗？

当 1940 年伦敦派我到设在纽约的英国安全协调局总部帮助维持这个秘密机构时，我已在专业的秘密情报机构干了二十年了。协调局情报网中的人员是业余爱好人员，因而人们以为那里需要我的特殊经历。这种关切最终证明是没有必要的。欧洲大陆上反纳粹的常规武装抵抗垮台，希特勒进入巴黎以后，我们的专业情报人员几乎被一网打尽，于是英国秘密情报局在欧洲毫无作为了。但是大量来取代专业特工人员的业余人员却能应付自如。

不久，我被要求起草建立一个美国情报机构的方案。这个机构相当于英国协调局，并以英国这些战时临时性措施为基础。“勇士”本人搞出了这个方案——这件事进一步证明，那些掌握了技能并在卓有成效的文职工作中证明了自己的良好品质的男女都能够非常出色地在自由世界里作出自己的秘密抉择。

详细的组织系统表已向华盛顿透露了。我为本书准备了其中一个简表，勾画了指挥机构的主要轮廓，特别澄清了“勇

士”在极端机密的情况中，在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之间所保持的不寻常的关系。

因总部设在洛克菲勒中心，我们的数千名特工和专家曾在第五街上的阿特拉斯神雕像下走过，然而，他们的身份和活动却仍伪装得很有效。不过，由于经过阿特拉斯雕像进入人挤得满满的协调局办公处的美国人越来越多，暴露秘密的可能性也就大大增加。令人吃惊的是，秘密还是保住了。

后来，到了六十年代，早在 1940 年设计好的外层保护壳突然被掀开了，协调局及“勇士”的活动泄露了一部分；主要说它是在美国努力挫败纳粹在西半球颠覆活动中起支援作用。到 1962 年才泄漏一些一鳞半爪的东西，这应大大归功于许多杰出的美国人的慎重态度。他们虽然明了协调局和“勇士”全部活动和目标的一部分或大部分，却仍然认识到，如果要成功地保卫民主国家的自由，反对各式各样日益增长的极权主义诡计，那就必须不把事情讲出去。

1962 年，我正忙于写一份苏联帝国主义的研究报告，当时伦敦的国防部和外交部组成的一个特别监察委员会讨论了泄漏部分秘密是否明智的问题。泄露此事采取出本书的形式。书名是《文静的加拿大人》（美国版本叫《3603 号房间》），作者是著名历史学家蒙哥马利·海德。他本人就是协调局一名足智多谋的官员。那时，我设法表明自己奉“更高权威”之命透露某些事情。这些事情当然只是谨慎地限定在透露协调局的“秘密”作用方面，丝毫未暴露该组织主要意图或高度敏感活动的全部情况。

这样，重要机密又保存了十年。1972 年，本书作者威廉·

史蒂文森同“勇士”经过多次的长时间讨论之后，向我提出建议，说全部透露此事利多弊少。我对这种看法是举双手赞成的。协调局史话是一项伟大的英美冒险事业的记叙，它开始于美国总统及其想法一致的同僚拯救英伦三岛使之免遭纳粹占领的时刻，尽管当时美国在法律上还处于和平状态。1972年，莫斯科通过其许多秘密机构，又在美国发动了一个十分强大的运动，图谋孤立这个可能再次拯救民主国家使它们不干蠢事的一个强大国家。我感到，提醒我们自己注意这样一点的时间到了：无论我们运用秘密多么感到遗憾，然而就在一代人时间以前秘密拯救了我们自己。现在，中央情报局成了一些人的主要攻击对象，这些人要立即解除我们的武装，这些人列举该局真正存在的或传说中的滥用职权的事例作为证明，要“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泼掉”，要剥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花了那么大的代价才取得的预防性防卫的主要手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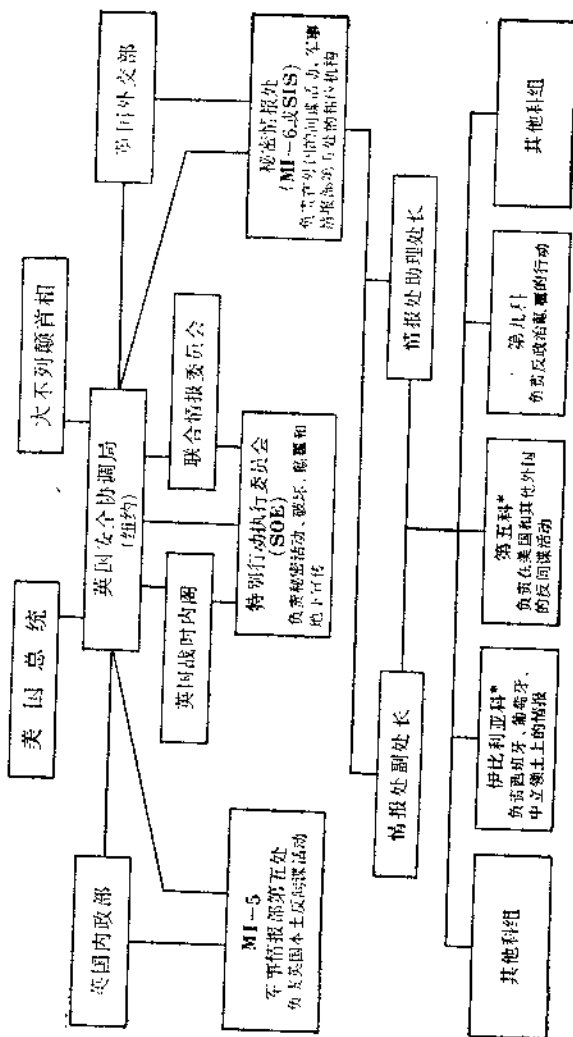
作为协调局的历史家之一，我欣然把自己的文献提供给作者，其中有导致威廉·多诺万将军的美国战略情报局诞生的组织系统表。“勇士”是战略情报局的助产士。读者自己可以看出，它如何开始在激烈的斗争中去拯救个人自由的。

现在我可以透露，1962年之所以打破有关协调局的沉默，是因为金·菲尔比逃往苏联。菲尔比是混进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高明的共产党特务。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反共科的工作，并且是争当那个传奇式组织的头头的主要竞争者。我们知道菲尔比走时了解协调局的情况。但我们也知道他不了解“勇士”的组织的全部深远意图。因此，我们只公布够用的事实来抵消菲尔比或其支持者可能揭露的任何

情况所造成的影响。但是，十年以后的 1972 年，我们也了解俄国人知道得相当多，并可能利用这方面情报打击我们的朋友，歪曲历史，伤害美加两国与英国的关系。最后全部公布事实真相是对这种威胁和对历史要求的回答。于是此书应运而生。

查尔斯·霍华德·埃利斯
于苏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

这是最初考虑战略情报局设想时透露给富兰克林·罗斯福许多图表中的一个简表



* 金·菲尔比在战争紧要年代里在这两个科任职,战后,他被提升到了情报处工作,而且似乎很可能当上处长。

大事记

1911 年

10 月 25 日 温斯顿·丘吉尔被任命为英国海军大臣

1913 年

3 月 17 日 富兰克林·D. 罗斯福被任命为助理海军部长

1914 年

8 月 4 日 威廉·斯蒂芬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加入加拿大皇家工兵

1916 年

3 月 威廉·多诺万* 受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美国战争救济委员会的派遣,调查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的情况

4/5 月 斯蒂芬森和多诺万在英国第一次会晤

9 月 斯蒂芬森在法国当战斗机驾驶员,属皇家飞行队 73 中队

1917 年

4 月 6 日 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8 年

11 月 11 日 德国垮台;丘吉尔所说的“三十年休战”开始

* 多诺万,旧译为杜诺万。——译者